

灵光中的本体论

——谢林后期哲学思想研究

王建军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目 录

第一章 谢林的生平与著作	1
第一节 天才出少年	1
第二节 耶拿大学年轻的教授	4
第三节 奔走维尔茨堡	10
第四节 慕尼黑的平静与躁动	14
第五节 柏林：“哲学的首府”	26
第二章 本体论的源与流	31
第一节 “本源”问题的提出	31
第二节 从“本源”到“存在”	35
第三节 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	38
第四节 从存在到上帝	45
第三章 谢林哲学的“转向”	51
第一节 谢林后期哲学思想转变的原因	51
第二节 谢林后期哲学转向的实质	56
一、自然哲学	56

二、先验唯心论	58
三、同一哲学	67
第三节 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	87
一、理性哲学的局限	87
二、肯定哲学与启示哲学	93
第四章 潜能学说	99
第一节 潜能的含义	100
第二节 潜能的纯净状态：作为可能存在之原则的潜能	102
第三节 潜能的紧张状态：作为实存之原则的潜能	111
第四节 作为第一因的 $DA\beta$	115
第五节 潜能学说的意义	118
第五章 神话哲学	122
第一节 神话的本质	122
一、神话是人类史前史的真实内容	122
二、神话是人类精神中无意识心理的外化	127
第二节 诸神的交替	131
一、神 B 的时代	133
二、神 A^2 的时代	148
三、神 A^3 的时代	158
第六章 永恒创世学说	162
第一节 有限与无限	163
一、有限的来源	163
二、有限物的虚妄性	168
第二节 上帝与创世	172

一、创世的概念·····	172
二、创世的动机·····	174
三、创世过程·····	181
四、三位一体与创世·····	186
第七章 自由学说·····	195
第一节 原本质的内在原则·····	197
第二节 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	203
第三节 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207
第四节 谢林自由学说的实质·····	215
主要参考书目·····	218
后记·····	222

序 言

黄颂杰

这本著作是王建军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写的是谢林后期的哲学思想。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西方学术思想大量传入我国，现当代西方哲学迅速为我国学术理论界所关注。在“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之后，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晦涩难懂的哲学思想也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90 年代以来，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等更晚近的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实践哲学又成了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学者们的课题和研究生们的论题大多数集中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当代哲学。书市上各种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论著、译著琳琅满目。相比之下，19 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哲学，除了康德之外，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事实上，不了解古代、近代的西方哲学，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当代西方哲学，这一点已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认同。王建军在选择他的博士论文的论题时，头脑十分冷静而清醒，虽然他对现当代西方哲学也十分关注和有兴趣，但最后还是确定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要正确理解和把握现当代哲学，

必须学好古典哲学；学术上要有创新成果，必须要有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当然，他同时也掌握了一些国外学术界有关谢林哲学的评价和研究现状，从中了解到研究谢林哲学的意义和价值。

这本著作虽然是写谢林后期的哲学，但并没有把谢林后期思想与前期思想割裂开来，更重要的是，作者从本体论的视角来审视和展现谢林的哲学，这不仅把握了谢林哲学的根本，而且抓住了整个西方哲学的要害。自古至今，本体论始终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尽管目前国际社会重实用、效用，但学者们还是不忘最形而上、最无直接的实用或实效的本体论。在我国，本体论已越出哲学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本体论这个概念的使用十分广泛，也可以说很宽泛，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当做学科的理论根基或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在哲学的演进中，本体论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本体论这个概念的涵义也被引申发挥或被修改变形，产生歧义。从哲学发展的历史看，这个问题关系到哲学的出路和方向、哲学的前途和命运。近年来我国哲学界讨论的近现代哲学“转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问题等等，都与本体论问题有关。在西方，一部分现当代哲学家试图以“语言转向”否定和超越传统本体论；另一部分哲学家则在解构传统本体论时，越来越认识到本体论与人类的生存实践密切相关。在传统本体论遭到抨击和批判的同时，各种新型的本体论思想不断涌现。本体论在现当代的重建，其问题和话语、形式和内容都与传统本体论不同，是哲学上的变革和转型。当前实践哲学的蓬勃兴起正与本体论的实践性走向相关。王建军博士关于谢林的本体论思想的研究无疑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有价值的成果。

与本体论问题密切相关，作者在这本著作中还从神学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谢林哲学。他认为：一方面，谢林哲学离不开神学背景；另一方面，又不能对谢林哲学作狭隘的神学的理解。应该说，这是一种有深度的见解。西方哲学从产生起就表现为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就是

要寻求宇宙万物存在的最终原因，最一般最普遍的原理或原则。这种追求总是导致一个最高实体、一种绝对者，最终形成一神论的上帝观念，使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结为一体。自从基督教产生以来，西方哲学和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代哲学是以对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批判为出发点的，但哲学家们在论证自己的学说时，最终还是离不开、也少不了神或上帝，而且把它置于自己构造的体系的顶端，作为自己体系的支撑或起点。近代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与数学及自然科学的理性是同步发展的。康德通过批判活动在理性的认识领域否定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否定了上帝作为自然界的最终原因和最高本质，否定了通过认识活动达到上帝；但是，他在理性的实践领域，为了达到至善，又设定了上帝的存在。康德试图通过对理性的批判使哲学和宗教明确各自的根据、范围和作用，他不是要根除哲学的神学品性，而是试图为哲学的神学品性找到更合理的依据和作用。但是，黑格尔反对康德把宗教排除在认识领域之外而归之于纯信仰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理性完全可以认识宇宙的本质和秘密，可以认识上帝。哲学和宗教在内容和对象方面是同一的，即都是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展现，只是展现的方式不一。当然，黑格尔所说的神、上帝就是绝对理念、绝对精神，也就是脱离了人的客观化、神圣化了的人的理性。他把神、上帝理性化，把宗教理性化、哲学化；反之，他也把哲学理性化、神学化、宗教化。谢林哲学同样也具有浓厚的神学品性，他的观点与康德、黑格尔既有相同之处，更有他自己的特点。王建军博士从神学视角对谢林哲学所作的分析和论证，为我们提供了西方哲学具有神学品性的一个典型。必须指出，西方哲学中的神或上帝具有双重意义：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主宰者，即宗教神；学理或逻辑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前提或假设，即理性神。在哲学家那里，这双重意义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谢林哲学中的神就具有这种特点。

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在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思路、为哲学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和方向的时候，对哲学的神学品性提出了怀疑、挑战乃至否定。但他们面临着一个难题：要彻底清除哲学的神学品性，必然会动摇甚至瓦解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基督教；要想保留并巩固基督教这根精神支柱，那么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也就不可能被彻底清除。谢林哲学的神学特性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这个难点提供了基础。这本著作从本体论和神学背景出发，将谢林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联系起来。实际上，这本著作的视角、观点、方法和具体的论述都显示出作者具有很强的现代哲学意识。

当然，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王建军还是个青年学者，虽然已具备了良好的专业基础，但尚未成熟和融通，这本著作难免有粗糙、不足和错误之处。就我所知，建军勤奋努力，好学不倦，不爱张扬，在认准方向，认定目标以后，更是锲而不舍，执着追求。正是这种品行使他能在学术领域里不断进取。这本著作只是起步，相信他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是为序。

第一章 谢林的生平与著作

第一节 天才出少年

在德国南部的符腾堡公国，有一个叫莱昂贝格的小镇，离首府斯图加特不太远。1775年1月27日，谢林就出生在这里。谢林的父亲是位神学硕士，才华出众，熟知多种古代语言，后来还成为符腾堡新教会的主教。

谢林两岁时，随全家搬迁到图宾根附近的小城贝本豪森。贝本豪森建于12世纪，这里风景秀丽，群山环绕，谢林经常嬉戏于山林之中，对大自然的奇迹赞叹不已。在接受大自然陶冶的同时，谢林也较早地受到了人类文明的熏陶与锤炼。他6岁入学，8岁时便开始学习古代语言。由于他天资聪颖，所以很快就能用拉丁文、希腊文、古希伯莱文和阿拉伯文写诗。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年满18岁以后才能上大学，但谢林用他的才气打破了这一陈规。不满16岁时，他便被图宾根神学院破格录取了。

图宾根神学院曾是德国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的母校。谢林进校时，这里的气氛比较沉闷，中世纪的风纪与教学方法几乎是一成不变地被继承下来。学生要穿黑色的校服，按时早起、祷告、早餐和上课。实际上，整个符腾堡公国在当时都是比较保守的，它有“牧师和录事的公国”之称。在这种氛围下，青年学生中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不满的情绪。他们不满于这种沉闷的生活，不满于神学

家们的冥顽不灵，更不满于他们对康德批判哲学精神的反应迟钝。符腾堡公国的南面就是法国的版图，那里如火如荼的革命离图宾根神学院只有咫尺之遥。于是，学生们便私下里组成康德哲学研讨小组，组织政治俱乐部，私下里阅读席勒的《强盗》、舒巴耳特的诗以及卢梭著作的手抄本。神学院学生的这种不满情绪和冲动自然要影响到谢林。谢林很快成了他们中的中坚分子。他把《马赛曲》译成了德文，在神学院的学生中传唱。这自然是件出格的事，于是很快引来了政治上的关注。公爵便把谢林这一帮人叫来训话。最后谢林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句“大人，我们谁都难免要犯许多错误的”。所幸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谢林另一个出格的地方在于，有一个学期，他的主修课竟然旷课52次！不过，宗教法庭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大度，他们并没有追究谢林的责任，还为谢林拼凑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我们认为，他虽然有意不上某些课，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无所事事，我们认为给他十四天假期还是应该的。”对于牧师们善良的庇护，古留加说是“谢林的运气不错”。^①但实际上，谢林是图宾根神学院名列第一的优等生，在他的记分册里，“才能”一栏里总是写着“felix”（5+）。不上课而成绩很好，这里多少也能看出一点谢林的独特之处了。

不过，谢林在图宾根的运气也确实不错，因为他在刚进神学院的时候便结识了高年级的学生黑格尔和荷尔德林，而且还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寝室里。三位天才的齐聚一室，这不能不说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这对于他们中间的每一位来说，都是件幸运的事。两位学兄曾给予谢林以巨大的鼓励。在谢林追随费希特的那一阶段时间里，荷尔德林温和地对谢林说：“放心好了，你取得的成绩一点也不亚于费希特，因为我听过他的课。”^②黑格尔则怂恿着谢林从费希特的阴影中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页。

^② 同上，第27页。

走出来，他坚定地向谢林说：“这是你的体系”。^①

在神学院五年的时间里，谢林的学术成就是丰硕的。他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两本专著，并先后通过了两篇论文答辩：

- 1、《对有关人类罪恶起源（按创世纪第三章）的古代箴言进行批判阐释和哲学阐释的尝试》（1792年9月26日，哲学硕士论文答辩）；
- 2、《论神话、历史传说和古代箴言》（1793年秋，发表于《记事报》第五期）；
- 3、《论哲学的可能形式》（1794年9月）；
- 4、《自我是哲学的原则》（1795年3月）；
- 5、《论马尔西翁对保罗书信的校订》（1795年6月，神学论文答辩）；
- 6、《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通信》（1795年6月）。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谢林的《对有关人类罪恶起源（按创世纪第三章）的古代箴言进行批判阐释和哲学阐释的尝试》一文，这是谢林为入学两年后的中期资格论文答辩而写的。按照图宾根神学院的规定，学生在进校学完两年课程以后必须进行一次的哲学硕士论文答辩，只有通过以后才有资格正式学习神学。答辩的材料通常是教授所写的论文，但是在破例的情况下，学生自己也可以写。17岁的谢林希望能在本次答辩中充分显示自己的古代语言的功底，决心好好利用这一次机会，所以还是由自己来撰文进行答辩。他在这篇文章中试图对《圣经》中的原罪的故事作一种神话的解释。最后，论文得到了斯努列尔教授的极高的评价：“我对你初次显露出来的才能和渊博知识表示祝贺，我确信你还有巨大潜力，学术界有理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② 教授奖掖后进的仁厚对于年轻的谢林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促进。在这篇论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后，竟有六家杂志载文对其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5页。

^② 同上，第12页。

进行了褒扬。后来谢林又对此文的内容进行了发挥，写成了《论神话、历史传说和古代箴言》，发表在《记事报》上。谢林认为，神话并不像启蒙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类愚昧的产物，是纯粹的臆造。神话是民族传统的产物，它是“一种承自父辈并转化成民族精神、性格、习俗和规约的东西，即使在对自然现象进行经验说明取得成功之后，它仍然长久存在下去”。^① 谢林在这篇文章中所展示的自信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在他的后期哲学中，神话问题仍然是他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在神话解释中所采取的那种历史主义的立场也一直没有放弃。

1795年6月，20岁的谢林以《论马尔西翁对保罗书信的校订》一文通过了神学论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这样他也就结束了五年的大学生涯。当他走出图宾根神学院的时候，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了。古留加说他在离校时已“达到了教授的水平”，这或许是没有夸张的。

第二节 耶拿大学年轻的教授

图宾根神学院的学生在毕业时有两种选择：留校当牧师或离校做家庭教师。谢林不想做牧师，所以只能选择后者。这时，谢林的父亲为他找来了两名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的学生——男爵里德塞的两个孩子，一个17岁，另一个15岁。在那时，家庭教师的地位是高贵却又卑微的。谢林在男爵家所受到的待遇经常是冷冰冰的礼貌，他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距离感和不被信任感。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贵族家的面包并不比普通人家的面包好吃。”当然，谢林对此还是能应付自如的，毕竟他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当他看到自己有时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页。

因为这点名声而赢得了盛情款待时，便又流露出一种思想者的居高临下感：“看到人们对纸上的东西毕恭毕敬是很有趣的。”^①

后来，男爵的孩子要去萨克森公国的莱比锡去接受高等教育，作为家庭教师的谢林也要一同前往。在莱比锡，谢林住了两年，直到1798年秋。在这期间，谢林陪着两个富有的少年去了不少地方，寻幽访古，倒也轻松自在。在去过的地方中，有两处给谢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处是荟萃了当时文化界名人的耶拿，另一处是普鲁士首府柏林。耶拿给谢林的印象与他先前的想像有着很大的反差：“举世闻名的耶拿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规模狭小，房屋破旧，城里除了大学生、教授和小市民之外别无他人。”不过，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作家席勒。在图宾根神学院的时候，席勒的《强盗》一书曾让他们那一帮青年激动不已。可以说，席勒代表着他在神学院的时光。现在，席勒就在眼前，这自然令谢林非常兴奋。不过，在与席勒的交谈中，这位文学大师给谢林留下的印象却与耶拿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象差不多：“著名作家在同人谈话时竟如此之畏葸……读席勒的书远比同他谈话要愉快得多”。^②或许，印象与想像之间的距离总是难以跨越的吧。

与耶拿城的其貌不扬相比，柏林城的市容则让谢林感到十分心旷神怡。他写道：“柏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房屋大多是按意大利风格建造的，不太高，多数是三层楼。整个说来，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③但是，谢林很快发现，柏林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却被一群庸俗之辈占据着。谢林去过当时科学精英的集会之地——文学俱乐部。他原本抱着很大希望并带着朝圣者的心情而去的。但去了以后，不仅演说者谈论的题目（《论医生的职责》）令谢林感到索然无味，而且演说者的那种自我欣赏的态度更让谢林受不了。尤其令谢林感到吃惊的是，周围的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1页。

② 同上，第33页。

③ 同上，第55页。

那些听众并没有与他有同感，他们对平庸的东西反倒听得津津有味。谢林对此感慨万端：柏林，太需要天才了！这又是一次印象与想像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激起了谢林的责任感与自信心。

谢林第一次去柏林，是1797年5月的事。当他从柏林回来时，他的《自然哲学的观念》一书刚刚出版。这是谢林自然哲学论著中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因为此书不仅是谢林从图宾根神学院毕业以后的第一本力作，而且它的意义更在于，此书所讨论的主题已与费希特完全不同。这是谢林从费希特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开始，也标志着谢林新的哲学阶段的形成。《自然哲学的观念》的出版使谢林的父亲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将来应当做些什么——老这样做人家的家庭教师怎么行啊？所以，他要为儿子在大学谋求一席职位，确切地说，要在图宾根大学为儿子谋求一个教授的职位。对于一个22岁的青年，连大学助教都不是，一下子就想当教授，老谢林有这种想法至少也算是不落俗套了。至于谢林本人，他也不想按部就班地从头做起，而希望自己一下子就能当上教授。不过，谢林瞄准的目标不是图宾根大学，而是耶拿大学。

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有一些距离的。图宾根大学的神学家们虽然对这位少年天才早有耳闻，但他们却把谢林看作是一位无神论者而拒绝接受。对于谢林来说，图宾根大学虽然并非是他的理想选择，但这种拒绝也无疑给他带来一些失望。至于耶拿大学那边，情况更糟，他们对谢林的请求根本就不予考虑。

谢林一面在为工作之事努力，一面也在不停地写作。1798年春，他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第二篇力作《论世界灵魂》发表了，这给他谋取教授职位的梦想无疑是添上了翅膀。不久后，从耶拿大学就传来了好消息：关于谢林的教授职位之事已被提上日程。谢林从中看到了希望，他的父亲则从中看到了另一种希望——进入图宾根大学的希望，对于老谢林来说，耶拿大学能把儿子的请求当作一回事，这无疑为儿子进

入图宾根大学增添了砝码。老谢林之所以希望儿子去图宾根而不是去耶拿，主要还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因为耶拿大学毕竟是一所“外国”的大学（它属于魏玛-萨克森公国而不是符腾堡公国）。但老谢林并不知道，此时的耶拿正有一大批人在为谢林的教授职位之事而摇旗呐喊，其中有巴乌留斯^①、尼塔默尔^②、费希特、席勒等人。在席勒的鼓动下，连枢密院顾问歌德也被拉了进来。对于谢林来说，这无疑是搬来了最有实力的救兵。歌德给魏玛部长福格特写去了推荐信，说谢林的头脑是“按最新的时尚构成的”，“如果有他在将是十分有益的：耶拿小组吸收这样一个成员将会加强自己的活动”。^③歌德是读过谢林的书的，《自然哲学的观念》与《论世界灵魂》他都读过，并且这两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格特部长当然不能忽视歌德的建议，他也不能不给歌德这个面子，于是他直接给耶拿大学下达了命令，让那边马上接受谢林前来任教授之职。耶拿大学当时同属于四个公国的共同管辖，福格特部长在既没有与其他三个公国的大公商量也没有考虑学校当局的意见的情况下就直接下达了接受谢林的命令，可见他给歌德的这个面子也算是够大的了。就这样，23岁的谢林终于如愿以偿地跨过了一系列台阶而直接当上了耶拿大学的教授。他写信给歌德，真诚地感谢他对自己命运的关怀。其实，歌德的这一举动不仅是对谢林个人命运的关怀，而且更是对德国哲学的整个命运的关怀。这是大师的胸怀。

就这样，谢林告别了家庭教师的职业。他先办了“出国”手续，再与里德塞家结了账，然后便踏上了充满希望的征程：目的地是耶拿，那个梦寐已久的地方！

① 巴乌留斯后来成了谢林的死敌。

② 尼塔默尔曾与费希特合作过。他也是黑格尔的好友，后来曾多次帮助过黑格尔，比如黑格尔去做《班堡报》的编辑以及做纽伦堡中学校长，都是出于尼塔默尔的真挚帮助。

③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8页。

然而，耶拿并不太平。谢林刚到这里，正赶上一股排斥费希特的风波，这就是所谓的“无神论之争”。^①在这一事件中，谢林虽然站在费希特一边，但并不像费希特那样激烈。毕竟，在耶拿他是新来乍到，而且机会也是来之不易。这样，他与费希特终于没能成为友人，他们同在耶拿大学工作了一个学期，但平时很少往来。对于费希特的出走与谢林的到来，歌德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颗星陨落了，另一颗星正在冉冉升起。”^②

不过，这颗新星在耶拿最多也只是一颗流星，因为谢林在这里也并没有逗留太长的时间。在不到五年之后，即1803年5月，谢林便带着自己的未婚妻卡洛琳娜一起离开了耶拿。

谢林离开耶拿，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卡洛琳娜的缘故而与耶拿浪漫主义小组关系搞得很不愉快。事实上，这个小组正因为谢林的介入而最终走向解体。卡洛琳娜本是耶拿浪漫主义小组的领袖奥·威·施莱格尔的妻子，谢林来到耶拿之后，卡洛琳娜爱上了谢林，并且最终投奔了谢林。这样一来，这中间的关系就很难理顺。尽管施莱格尔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相当冷静与宽容，但结果还是不欢而散。第二，谢林与昔日图宾根的同窗好友黑格尔的关系也搞得不愉快。黑格尔在毕业以后，一直在做家庭教师。1800年11月，他从法兰克福

① 1798年，《哲学杂志》第一期出版，费希特与尼塔默尔任该期的责任编辑。在这一期上刊登了弗尔贝格的《宗教概念的发展》一文，作者在此文中将宗教理解为纯粹的道德行为而否定其信仰的根据。该文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那不屈正这样一种向往，教会的作用不过是给善行以社会奖赏而以此来将人们联接在一起。费希特不同意作者的观点，想给他加一个编辑部的附言，但作者不同意。费希特使用自己的名义同时发表了一篇短文来反对弗尔贝格的对上帝存在的怀疑态度。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向当局告密。紧接着就下达了德累斯顿政府的命令，没收这一期《哲学杂志》并对出版人进行惩罚。人们劝费希特向当局作些解释，把事情化小。但费希特却将此事公之于众，还写了两篇答辩文章，这更遭到当局的斥责。费希特便写信给枢密顾问福格特，以自己的辞职的压力来维护自己的立场。不幸的是，费希特的辞呈却被当局接受了下来。1799年3月，费希特一气之下去了柏林。（参见古留加《谢林传》，第64～65页。）

②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9页。

给谢林寄来一封信，希望谢林能帮他与文坛熟人建立联系并设法弄一个职位。谢林便把黑格尔安置在自己的身边，让他作为一名副教授在耶拿大学讲课。1802年1月，谢林与黑格尔共同创办了《批判哲学杂志》并出版了第一期。这本杂志的撰稿人只有他们两人，而且也不署名。这样做其实并不好，实际上它导致了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因为原本应是两人共同智慧的产物如果要是被划到某一个人的名下，那么对于另一个人来说，这总是一件不愉快的事。^①况且，黑格尔自己的体系正在建立之中，他与谢林的合作也只能是暂时性的。于是二人之间的不快便慢慢地积累而足以损害彼此之间的友谊。第三，谢林与《文学报》之间结下的恩怨也是导致他离开耶拿的一个重要原因。浪漫主义者奥·威·施莱格尔曾是《文学报》的编辑之一，并在该报发表过三百多篇文章。后来他与该报发生了冲突，原因是该报发表了攻击浪漫派的文章《B 贵族的密信》（尼克莱撰文），于是，施莱格尔便号召大家一起来反对该报的主编许茨。谢林其实与这件事没多大关系，他之所以要卷入进去，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亲浪漫派的倾向，尤其是在卡洛琳娜也属浪漫派成员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也因为《文学报》曾经对他的《自然哲学的观念》持否定态度（其实这并不算什么，但因为他与浪漫主义小组有了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那《文学报》的过错就与其大小没多大关系了）。1802年4月，《文学报》在评论几位医学博士的论文时出现了“尽管他们赞同谢林的自然哲学，但他们仍然是有理性的和规规矩矩的人”这样的话。这使得谢林十分恼火，他便毫不犹豫地撰文对之进行猛烈的抨击。这篇文章题为《对自然哲学的蒙昧主义态度》。但对方也毫不示弱，很快就以《对最新哲学的赞扬》这本小册子加以回敬。这本小册子还对

^① 据认为，《论批判哲学的实质》、《论自然哲学对一般哲学的关系》两文都有谢林的参与，但后来它们都被归属于黑格尔的名下。参见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1～122页。

一些流言蜚语添油加醋地进行了发挥，比如说卡洛琳娜女儿的死因与谢林有关等等。这下谢林可招架不住了，他只好向自己的情敌奥·威·施莱格尔求援。施莱格尔也算大度，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为谢林排忧解难。但无论如何，谢林与《文学报》的这一次交锋着实弄得他十分狼狈（这件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谢林自己的不理智与咄咄逼人造成的。他后来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在类似的情况下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与《文学报》的冲突减少了谢林对耶拿的留恋。

但不管怎么说，在耶拿期间，谢林还是走过了他学术上的一段辉煌的历程。在这里，谢林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前期哲学的代表作《先验唯心论体系》就是1800年4月在这里发表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动力过程的一般演绎》（1800）、《布鲁诺》（1802）、《论学院研究的方法》（1803）、《艺术哲学》（1802～1803）（此时还没有写完）等等。所以，如果从学术上来讲，耶拿没有亏待他，而是让他载誉而归。

第三节 奔走维尔茨堡

1803年5月，谢林带着卡洛琳娜离开了耶拿大学，回到了父母居住的小镇莫尔哈特。老谢林对这个儿媳是十分欢迎的，这不仅因为卡洛琳娜的到来了却了他为人之父的一桩心愿，还因为他本来就认识并尊敬卡洛琳娜的父亲：著名的东方学家哈艾里斯教授。6月26日，谢林与卡洛琳娜举行了婚礼，随后，他们去了斯图加特、图宾根以及谢林少年时代居住过的贝本豪森。对于谢林来说，在新婚之中能与自己的爱人重温童年与少年的时光，那种感觉当然是温馨而甜蜜的。这种诗意的生活也正适合于他创作在耶拿期间尚未完成的《艺术哲学》。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谢林现在没有了职位。耶拿虽然吵吵闹闹，但他在那里毕竟有自己的工作与事业。

在家乡闲居的这段日子，谢林还出乎意料地遇见了昔日的好友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此时已因一场精神悲剧而弄得丧失了理智。^①他衣衫褴褛地从远道来看望谢林，这使得谢林感慨万端，当然也十分感动。谢林想给他一些帮助，但现在自己也是困难重重。他便写信给耶拿大学的黑格尔，希望黑格尔能伸出援助之手，毕竟他们三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但黑格尔除了寄来一些同情的话之外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②

与荷尔德林的邂逅无疑加深了谢林心中那份淡淡的失意感。不过，好在他现在已是名声在外，用不着过于担心工作的事情。果然，巴伐利亚的维尔茨堡大学此时正在进行改革，渴望招揽到德国最优秀的人才。改革者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谢林。这样，谢林很快就接到了维尔茨堡大学发出的邀请。

然而，维尔茨堡大学在邀请谢林的同时，也同样邀请了谢林在耶拿时的死敌、《文学报》的主编许茨。真是冤家路窄。谢林不想再次被卷入无聊的是非之争当中，他便给慕尼黑一位主管巴伐利亚各大学的官员写了一封信，向这位官员表示：要么接受许茨，要么接受谢林。这位大人经过权衡之后，最终选择了谢林。1803年冬季学期，谢林出现在维尔茨堡大学的讲坛，讲授《论学院研究的方法》和《艺术哲学》，而许茨则前往哈勒大学。

谢林虽然阻止了许茨来维尔茨堡大学，但却未能因此而免于是非

^① 荷尔德林本来在法兰克福一位富商家做家庭教师，后来他与女主人发生了恋情，因为他把女主人看成了希腊女神狄奥蒂玛的化身。后来事情败露，他只得离开法兰克福，但这次不幸的恋爱对他打击很大。之后，他希望能到耶拿大学教授古希腊文学，但没能如愿，只好去了法国的波尔多任教。后来他听说自己的恋人由于内心痛苦而忧郁地死去，这给荷尔德林的震动极大，他连夜从法国赶回德国。这时，他已经精神错乱，以后又因为一系列的不幸和挫折使他的精神彻底地崩溃。晚年，他独居于图宾根内卡河边的一个塔楼里，在一位好心的木匠的照顾下了却了他悲剧性的一生。参见张慎《黑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② 但我们不要忘记的是，黑格尔当初在伯尔尼做家庭教师，倍感寄人篱下和思乡之苦时，是荷尔德林把他介绍到法兰克福做家庭教师的。

之争。他来这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针对他的反对者同盟。同盟中有来自耶拿的神学家巴乌留斯，谢林在一开始还以为他可以成为自己的战友（巴乌留斯曾为谢林去耶拿大学之事而呼吁过），但后来谢林才发现巴乌留斯实际上是自己最主要的敌人：“我见过许多恶汉，从他们那里体验过许多恶毒，但还没有遇到过像巴乌留斯这样的恶汉，无论从谁那里也没有体验过比从他那里所体验的更多的恶毒。”^①如果说谢林在耶拿时所受到的一些攻击，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自己的锋芒毕露所致，那么在维尔茨堡他却完全是被动和无辜的。在这里，对他的攻击主要来自于天主教正统派。他们不满意政府的革新措施，认为改革使得新教牧师与天主教徒享有同等权利，而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谢林是新教教徒（其实巴乌留斯也是），所以他在这里总是被别人以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着。

曾写过《对最新哲学的赞扬》这本攻击谢林的小册子的作者——天主教教徒贝尔格如今又在炮制新的抨击文章：《塞克斯还是谢林的绝对认识》。谢林的一些学生站出来维护老师，并贴出墙报来讽刺贝尔格，结果，自然引来了接二连三的诽谤文字。更为糟糕的是，反对者为了整治谢林，还设法争取到权势者的支持，使谢林的授课都遇到了困难。中学生被下令禁止接触谢林的哲学，谢林本人则被宣布为巴伐利亚“不受欢迎的人”。维尔茨堡的丑陋使得谢林在这期间的学术成果显得很单薄。在这期间，他只写了一本较有份量的书：1804年春出版的《哲学与宗教》。这本书篇幅不大，谢林只用了八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写作。然而它却标志着谢林前后期哲学的转向。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谢林对自然哲学的兴趣正在锐减，对艺术哲学的情调也在消失。他转向了人类的事业：“从那时起我明白了，宗教、公众信仰、国家生活，这就是一切要围绕它而旋转的中心，力量恰好应该放在这里，以便使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91页。

麻木不仁的广大民众振奋起来。”^①应当说，谢林的这种志趣的转变与维尔茨堡嘈杂纷乱的人际关系是不无瓜葛的。

1805 年秋，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导致了欧洲版图的重新划分。素有“自由州”之称的巴伐利亚^②作为法国的同盟国现在变成了一个王国。虽然它的版图有所扩大，但维尔茨堡却从中被划了出去而隶属于奥地利王朝。谢林对政局的这种变化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在奥地利王朝，他将要面对更为反动和保守的封建势力，将要面对正统的天主教势力。谢林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此地不会久留。毫无疑问，我们这些受聘人员不会被新政府留用。”实际情况正如谢林所预料的那样，不久以后，维尔茨堡大学全体新教教徒都被解职了。但谢林在此之前，已经在未雨绸缪，把眼光投向了巴伐利亚王国的慕尼黑科学院，因为此时适逢该院正在准备改革和扩大编制。1806 年 3 月 24 日，谢林在维尔茨堡大学上完了最后一课，学生们知道他就要离开，为他组织了热烈的欢送会。4 月，谢林前往慕尼黑去拜访雅可比，因为此人即将上任为科学院院长。说到雅可比，谢林在耶拿时曾在《批判杂志》上撰文攻击过他，所以他对此能否与雅可比谈妥，心中并没有多大把握。不过，等到了慕尼黑以后，谢林才感到释然。雅可比并非睚眦必报的小人，相反，他十分友好地接待了谢林。谢林对他的印象是“和蔼可亲”，但他也有个小毛病，就是在交谈时喜欢引经据典。谢林甚至还和雅可比谈到了自己的妻子卡洛琳娜，雅可比当时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说卡洛琳娜如何如何地好，但后来雅可比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却又说谢林其实是找了一块“绊脚石”做老婆……。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143 页。

^② “自由州”的名称主要是指巴伐利亚一直实行的是共和主义，而不是君主主义。

第四节 慕尼黑的平静与燥动

1806 年 7 月，谢林终于获得了国王的诏书，被任命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此时科学院尚未正式成立）。9 月份，事情得到全部的落实。

在科学院工作与在大学不同。这里要清冷一些，没有大学生那种迷醉而期待的眼神，所以谢林刚来时有些不适应，甚至感到有些压抑。他不打算在这里久留，这里只不过是暂时的栖息地而已，大学讲堂才是他最终要去的地方。然而实际的情形却是，他再次跨进大学的讲堂，那已是十五年以后的事情了。至于最后离开慕尼黑的工作岗位，那还要等到 1842 年的普鲁士政府对他的新的委任，而在此期间，时光一晃就是三十六个年头。

1807 年夏，巴伐利亚科学院经改组和充实之后隆重揭幕，第一任院长雅可比发表了讲话（谢林却对讲话的内容不以为然）。10 月 12 日国王要对科学院进行正式的命名，这次要求谢林院士发表公开演说。谢林明白，这对他来说既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机遇，所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搁在一边而专心准备这次演讲。在命名日那天，谢林没有使人感到失望，他的讲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卡洛琳娜对当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她说谢林的慷慨陈词征服了全体听众的心。卡洛琳娜的描述是符合实情的，因为谢林的演讲不仅在此之后的几个星期被人们兴奋地谈论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给王太子路德维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因此，谢林的《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这篇演说实际上成了他仕途的重要开端——他很快便受命来组建艺术科学院，并于 1808 年 5 月被正式任命为艺术科学院秘书长（科学院院士的职位仍然保留）。作为秘书长，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丝不苟地做着诸如主持会议、起草工作报告、签署文件等一些事情。这些例行事务虽然离哲学有些遥远，但也给谢林带来了回报：谢林现在毕竟不缺钱

花了，而且他的社会地位也十分耀眼。他现在成了“封·谢林”——他已被授予了勋章，上升到了贵族阶层。这些对于曾做过家庭教师的谢林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变化。就在谢林担任秘书长职位后不久，他的同窗黑格尔也在纽伦堡担任了文科中学的校长（1808年11月）。^①

黑格尔校长在上任之前并没有忘记给谢林寄去了自己的新作《精神现象学》（谢林是在1807年的夏天收到这本书的）。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把谢林的“绝对同一性”称作是“黑夜观牛，一切皆黑”。^② 谢林可能是新官上任比较忙，所以他直到11月2日才给黑格尔回了信，附信还寄去了自己的演说词《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在信中，谢林以友好的、却也是不解的口气问黑格尔：“你为何要把概念和直观对立起来？”^③ 概念与直观的对立，也许正是这两位同窗好友最后终于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所在。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批评当然让谢林感到十分不快。1809年春谢林出版了他的《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这是谢林生前最后一本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后来他曾在1812年发表过一本抨击雅可比的小册子。）在这本《选集》中谢林首次发表了《对人的自由本质及与之

- ① 黑格尔在谢林1803年离开耶拿后，继续在耶拿生活了近四年（直到1807年3月）。他离开耶拿，一方面是因为1806年拿破仑军队占领耶拿，将他的家产洗劫一空，从而使他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女房东生下了私生子路德维希（1807年2月）而闹得满城风雨，这令他感到极不自在。离开耶拿后，在同乡尼塔默尔的介绍下去了班堡任《班堡报》的主编。但是，由于当时当局对报刊的言论控制极为严厉，黑格尔很快就对《班堡报》失去了兴趣。而在这时，尼塔默尔正受聘为巴伐利亚王国国民教育的主管，他再次热情地向黑格尔伸出了援助之手，请他加盟。就这样，耶拿大学的副教授黑格尔于1808年11月正式成了巴伐利亚王国纽伦堡文科中学的校长，而且他这个校长一做就是八年，直到1816年海德堡大学的副校长道伯（Daub）向他发出热情的邀请。
- ② 黑格尔是这样说的：“考察任何一个有规定的东西在绝对里是什么的时候，不外乎是说：此刻我们虽然把它当作一个东西来谈论，而在绝对里，在A=A里，则根本没有这类东西，在那里一切都是一。无论是把‘在绝对中一切是一’这一知识拿来对抗那种进行区分的、实现了的或正在寻求实现的知识，或把它的绝对说成是黑夜，就象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那个黑夜一样，这两种作法，都是知识空虚的一种幼稚表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页。）
- ③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89页。

相关的对象所作的哲学研究》（简称为《自由论文》）。在《自由论文》的序言里，谢林谈道，自己曾在《思辨物理学杂志》中对自己体系的阐述不够详细和透彻，所以它只是在极少数人那里得到了真正的理解，“在这种片断的东西问世后，一方面立即就开始了诽谤和歪曲，另一方面也开始了解说、加工和逐译，其中最坏的一种类型就是将其译成所谓的天才的语言”。^① 古留加认为，谢林讲这段话“似乎是”针对黑格尔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似乎”问题。后来谢林在一封信中说到“明里暗里攻击过作者的人”，这里面也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1810年的《克拉拉》这篇哲学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批评是如何耿耿于怀的。他说：“一本具有一系列优点的哲学书出版了，它用全然不可理解的语言写成，充塞着不妨说是各种各样的野蛮的东西……必须用这些可怕的生造的词吗？难道不能以人人明白的人类的方式谈同一件事情？一本书要成为哲学书，就非得艰涩难懂不可吗？”^② 不过，此刻的谢林在性格上已改变了许多，他不像以前在耶拿或维尔茨堡时那样锋芒毕露了。他并没有将《克拉拉》这篇对话给黑格尔寄一份去，这篇对话也从没有发表过。心中的不快只是在心中作自我化解，也许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使他的心境和处事态度变得缓和起来。况且，谢林的生活世界中此时已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就是他的妻子卡洛琳娜于1809年9月去世了。

谢林虽然是卡洛琳娜的第三任丈夫，但谢林对卡洛琳娜却是十分呵护的。卡洛琳娜也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融入到谢林的事业之中去，化成了谢林哲学创作中的内在的动力。卡洛琳娜曾在一封信中说：“你的生活，你的著作对我来说就是神圣的事业，而献身神圣的、符合上帝

- ① 谢林：《自由论文》，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 ②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07页。

旨意的事业就意味着最大的幸福。”^① 外界对这一对夫妇的评头论足反倒更促使他们相依为命。如今卡洛琳娜的死无疑使谢林沉痛万分，在他给亲朋好友的一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她是无比独特的生灵，要么爱她的全体，要么根本不爱。直到最后的日子，她完全保持着这种征服人心的本领。神圣的联系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在患难中彼此信任，自从我失去了她，一切创伤又重新裂口。”“这个生命已经不能再有别的价值，我不能擅自轻生，把它贬值是耻辱；忍受它的惟一办法是用永恒的眼光去看它。在我们失去一切——祖国、爱情、自由——之后，活下去的惟一理由只能是要完成我们业已开始的事业。”^② 这种中年丧妻的沉痛使得谢林在慕尼黑感到非常郁闷，于是他在 1810 年 1 月请了长假，来到了斯图加特的妹妹家住下。在没有卡洛琳娜的日子，忧伤时常向他袭来，他只有通过大量阅读来抵抗这种忧伤。后来，当地的一位法学家盖奥尔格建议谢林在一个哲学爱好者的团体中讲讲他的哲学。谢林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便有了《斯图加特座谈》。

斯图加特座谈前后一共举办了八次，在这里，35 岁的谢林沉静而明晰地叙述着自己走上哲学之路后的这一段心路历程。从自然哲学到同一哲学，再到自己不久前所构思出来的自由哲学，他娓娓地叙述着自然、人、上帝。正如在前面所引的那封信中所说，他现在是在“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世界。^③ 在这种眼光下，人不过是自然的世界与神的世界之间的联系环节。但是，人却并没有认识到他只是这样的一个环节，人的自由使他毁灭了自己的使命，因此便有了自然与精神之间的不和谐，于是便有了死亡：人正是在这种不和谐中才死去的。这既是谢林对他的自由哲学的新的发挥，也是他当时心境的一种表白，他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103 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 196 页、第 199 页。

③ 同①，第 246 页。

从卡洛琳娜的死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斯图加特座谈的起因是谢林为了转移自己悲痛的心情而作，但这种移情作用只能是外在的和暂时的。谢林不希望让自己的情感世界老是处于这样一种破碎的状态中，他要对它进行修复。这时，巴乌琳娜小姐逐渐走进了谢林的情感世界。巴乌琳娜是卡洛琳娜一位密友的女儿，谢林曾经见过她一面，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巴乌琳娜还是个小姑娘。卡洛琳娜去世后，巴乌琳娜给谢林发来了唁函，她称卡洛琳娜是她的第二母亲，“我们对她的爱联接了我们，如今回忆又把我们联在一起。”对于情感正处于低谷中的谢林来说，虽然巴乌琳娜小姐长得什么模样他已经记不清了，但巴乌琳娜在信中的安慰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著的。两人的情感在飞鸿中悄悄地传递着，目标也逐渐趋于一致：重建美好的家园。1812 年 6 月 11 日，新的家园终于重建了起来，婚礼在哥达举行。

在婚后一段时间，谢林无疑是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之中，可能也只有在这种心境下，他才于 10 月份专程去纽伦堡去看望黑格尔。一年前，41 岁的黑格尔与比他小 20 岁的玛丽·封·图赫小姐结婚。

然而，生活的富足与精神上的松弛也许正是哲学创作的敌人，这正如古留加所言：“悟性能够造就幸福，但它却毁了创造的基础……生活既是散文式的，便不可能有诗意。”^① 谢林的《世界时代》一书的难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 1811 年春，谢林就已经写好了其中的第一部分，但由于他对此书抱有太多的希望，想把这本书弄成一个大部头的作品，所以在出版上便一拖再拖。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这样写道：“《世界时代》这本书我欲罢不能。这是爱的结晶，多年孕育的结果。我缺少的只是能安心工作的环境，但到复活节前总会有个眉目的。”可是在复活节到来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一年，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246 页。

他一方面为张罗自己的婚事而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欧洲上空的战争乌云越积越沉重,这使谢林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办一份涉及宗教、艺术、文学等各门学科,但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杂志,于是就有了《德意志人必读的全德杂志》。这份杂志虽然只出了四期就停刊了,但它却耽误了谢林一年的时间。1813年,谢林写完了《世界时代》的第一卷。当该书正在排版中的时候,战争爆发。谢林认为,在这个充满战乱与风雨飘摇的年代,让自己的力作流落到无所遮挡的大海上,实非自己所愿,所以他认为《世界时代》没有必要急着出版。这样,出版的事又一次被耽搁了下来。转眼间1815年的复活节就要到了,谢林想到的却是如何从出版商那里预先支出一笔稿费。他把自己的计划向出版商摆了出来:《世界时代》打算出三卷,而这第一卷“可看成是我近二十年来努力的结果,……[它]必将成为这类思想中的经典之作,因为我已不能给这一卷多增一个字或多改一个字”。^①谢林在这里言过其实是显然的,后来叔本华大肆攻击谢林的人品,也可能与这一点有关。叔本华说谢林不应该“被列入值得尊敬的人类思想家行列”,谢林的思想不过是“伪哲学”,是“肤浅的漫无边际的闲聊”、“厚颜无耻、假装高雅的夸夸其谈”。^②当然这只是叔本华个人的看法。在谢林同时代的人中,为谢林唱赞歌的人也为数不少,其中就有歌德、洪堡等人,至于政界就更不用说了。^③就《世界时代》这本书而言,他确实坚持着力在写。为了写这本书,他甚至还独自一人搬到了城外居住,以保证工作的进度。他在第一卷的写作中,先后三易其稿,但最终还是不满意。就这样,他的写作虽然一直持续到1820年他离开慕尼黑去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3页。

② 威廉·魏施特:《后楼梯——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考》,李贻琼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

③ 亚历山大·冯·洪堡称谢林是“德意志民族最富有思想的人”。歌德盛赞他具有“一流的才华,是很久以来我们就了解的、尊敬的”。(参见威廉·魏施特《后楼梯——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考》,193页。)

埃尔兰根大学兼职为止,但这本书总不能令他感到满意,所以,《世界时代》在谢林的生前终于没有被发表。

我们不禁要问,谢林究竟是怎么了?是富足的生活使他感到江郎才尽,还是在思考什么更高深的东西,以至于难以言表?应当说,这两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是存在的。一方面,谢林在生活的心境方面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谢林同时代的人说,谢林的许多棱角已经磨平,他以前的专断现在已为善良所取代。她的妻子巴乌琳娜也说“谢林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好的人,我们俩心心相印,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完全一致,我们不分彼此,相亲相爱。”^①谢林与巴乌琳娜一共生了三个孩子,这使得谢林与巴乌琳娜在一起的生活同以前与卡洛琳娜时相比是绝对不一样的。这种大家庭的幸福虽然给谢林带来了一种宁静的心态,但同时也使他的工作效率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之所以要搬到城外去住,正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另一方面,谢林的思想中此时正蕴育着一场巨大的狂风暴雨——在这场暴风雨中,他要把自己多年来所思考的东西都统统称为“否定的哲学”。(当然,黑格尔的那一套东西也要包括进否定哲学中去!)而这样做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他必须对方方面面进行深思熟虑后才能作出这样的宣告。那么这需要时间,当然也需要勇气。

1819年,谢林的健康状况欠佳,有人劝他到巴伐利亚北部气候温和的埃尔兰根去疗养。那里还有埃尔兰根大学,可以在那里讲学。对于离开大学讲坛已有十五年的谢林来说,这自然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令他感到高兴的是,慕尼黑政府允许他带薪去疗养,而且时间不限。1821年1月4日,谢林出现在埃尔兰根大学的讲坛上。在这里,他没有正式的职位,因为这里没有教授职位的空缺。不过谢林认为这无所谓,只要能讲课就行,况且,校方允许他在讲座的开设方面拥有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231页。

充分的自主权，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作为“德国最杰出的智者”（学生这样称呼他），他在埃尔兰根充分地享受着自己的特权。不过谢林并没有滥用这种特权，他要利用讲坛来将长期萦绕在自己心头但却并非十分明晰的思想给“逼”出来。讲课对于谢林来说是轻车熟路，他对其中技巧的掌握是十分娴熟的。所以，在埃尔兰根的第一次讲课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思想也显得“神一般地清晰明白”（学生的笔记中这样说的）。谢林在这里讲了些什么呢？他在埃尔兰根大学一共呆了五年，所讲授的内容主要有《哲学的总导论》、《神话哲学》等。在这里，神话哲学成了谢林新的关注对象。关于神话，谢林早在图宾根神学院时期就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神话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这既与他在慕尼黑时所接触到的神秘主义（如星相学、人的特异功能等）有内在联系，也与他作为艺术科学院秘书长，经常接触到与古代神话有关联的艺术创作有密切关系。在关于神话的演讲中，他强调神话与知性的对立，神话是对思想的彻底背离，因为神话是排除反思与沉思的，而思维的理性化则意味着对神话本身的摧毁。这一立场对于谢林来说其重要意义在于，他从神话的世界中看出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局限。不过，谢林在埃尔兰根大学关于神话的讲演还只是开端性的，他的成熟的神话哲学思想是后来在慕尼黑大学完成的。

1825年10月，巴伐利亚国王去世，王太子路德维希继位。路德维希是谢林的崇拜者，所以他的掌权对于谢林来说是个好消息。新王即位以后，在首府组建了慕尼黑大学，理所当然要邀请谢林前来为大学增光。谢林也不会拒绝的，只是他现在还在牵挂着他一直未竟的《世界时代》。于是，他向国王请求先给他一年的假期，他将于1827年冬季到慕尼黑大学上课。后来，一年的假期过完了，但《世界时代》的出版工作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1827年转眼就到了，这年5月，谢林被任命为王家学术档案馆总监。8月，他又被任命为科学院的院长（原来的雅可比院长已于八年前去世）。看来，新国王对谢林是否

完成《世界时代》并不介意，重要的是，他需要谢林为他支撑门面。要知道，在普鲁士的首府柏林，德意志又升起一位新的哲学明星，这就是黑格尔。黑格尔在做中学校长时，就完成了《逻辑学》的写作，海德堡大学因此而及时地将他从中学挖走。在海德堡，黑格尔又出版了《哲学全书》，这更使他名声大振。1818年，普鲁士国王任命黑格尔为柏林大学教授，1829年，黑格尔还当选为柏林大学校长。

谢林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存在是不能置若罔闻的。这些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的锐气消耗得太多，如今，昔日的同窗在北方一个劲地出版一些大部头著作，这当然使谢林的心境有些不平静，压力与失意之感都不禁油然而生。所以他在给路德维希的信中不无焦虑地说：“我已多年没有写出过任何像样的作品……”。是啊，顺境中的生活为什么总是过得太快并且总显得有些平庸呢？

1827年10月，谢林从埃尔兰根搬到慕尼黑。他带着他的高贵的地位，也带着他那为外界所捉摸不透的新思想出现在慕尼黑大学的讲坛上。他首先用了44次讲座来对整个近代哲学的流派进行了详细的、批判性的分析，这些讲座后来在他去世后整理成为《近代哲学史》。在《近代哲学史》中，谢林提出了所谓的“肯定哲学”与“否定哲学”的概念。谢林认为，自笛卡尔以来，直到他自己的同一哲学，当然也包括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否定哲学”。否定哲学虽然并非都是错误和虚假的，但它毕竟不能认识“最终的真理”，因而它必须向“肯定哲学”过渡。在谢林的这些论述中，黑格尔哲学似乎成了他的主要攻击目标，有位名叫S.阿尔谢列的人写信给歌德说：“谢林最近的演说充满了尖锐的论辩，他象对待一只侵占别人巢窝的杜鹃鸟那样来对待黑格尔。他不仅在叙述方面生动具体，有过人之处，而且他在长期沉默的年代里养成的用语准确、明晰和锋利也使他获得了很大成功。这样一来黑格尔艰涩难懂而又缺乏表现力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混合物就为他提供了极好的嘲笑材料。他断言，所谓的黑格尔的纯粹思想，就其本身来

说,只不过是一种极度的空虚,它之所以获得了内容和引起了兴趣,只是由于它的发明者的能言善辩和不遵守逻辑规定,而这对于哲学家来说则是最坏不过的事儿。”^①其实,谢林用不着那样抑制对手来抬高自己的哲学,因为针对黑格尔的指责也许正道出了他自己的底气不足。他的痛处在于他已有近二十年没有正式出版过一本能让他自己感到满意的作品,而黑格尔却一直在辛勤地著述,并博得了“德意志第一哲学家”称号。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谢林又如何能心平气和呢?不过,谢林还是有其伟大之处的,至少,他在这种困难中宁可不出版任何书,也决不愿粗制滥造。其实,他的思想并不因为没有变为铅字而减少了它们的实际上的价值。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如果没有谢林此时的困惑,那很难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在这一意义上,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或者说攻击),就不能完全被说成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或个人的胸怀问题,它从其更高的层面上来说乃是绝对理性主义与它的反叛者之间的第一次正式的对垒。谢林批判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泛逻辑主义”,在那里,哲学的出发点是抽象的存在,但实际上这种抽象的存在是并不存在的;此外,这种泛逻辑主义用概念取代了自然界的实际发展,这使得自然界变成了“概念的垂死挣扎”。谢林认为,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抄袭了他早期自然哲学中的方法,但是黑格尔又没有抄好,所以他把一切都给弄颠倒了:“自然界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干巴巴的概念。自然界曾有过的果实累累的情况变成了逻辑游戏,自然哲学的鲜花盛开的花园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墓地。”^②

在理论上攻击一个人,就很难做到在实际生活中再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因为要在学问与人品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划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1829年的夏天,图宾根神学院的两位同窗好友的最后一

①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62页。

②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59页。

次见面所引起的一些心理变化就是很微妙的了。这次相遇纯属偶然,谢林正好在卡尔斯巴德疗养,黑格尔则从布拉格来,路过这里。两人交谈了几个小时,气氛倒也热烈,只是谢林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却表明了他在这种热烈气氛背后所隐藏着的某种不真诚:“昨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询问我,那声音听上去很令人讨厌但却又有点耳熟。后来那个陌生人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原来是柏林的黑格尔。……午饭后他又到我这里来了,显得乐于助人而又亲切友好,仿佛在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①也许,对于黑格尔来说,虽然不能说他们之间以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但毕竟,现在都已是成名的哲学家了,而且在年龄上,都已不再年轻,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放得下呢?谢林对黑格尔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宽宥,这是有些让人感到遗憾的。谢林这个人有这样一个特点:一方面,他对于己有恩的人总是念念不忘,比如对歌德,他一生都在感激,最后当歌德逝世的噩耗传来时,谢林赶紧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为歌德作了一个专门的演讲。但另一方面,他这个人一旦与人接上火,便再也不会再有转机的出现。这真所谓爱憎分明。所以,在与黑格尔出现隔阂之后,从心理上说,谢林再也不能把黑格尔看成是朋友了。在这次会面的两年以后,黑格尔便去世了。谢林甚至连一封唁函都没有发过去,更不用说去参加黑格尔的葬礼了。所以也难怪黑格尔的妻子和黑格尔的一位学生要向他索回黑格尔的书信。两位图宾根的同窗好友最后弄成这个结局,也真是让人感慨万端。

在慕尼黑大学,谢林还是没能出版一本像样的书,这与他作为慕尼黑大学的最高权威的身份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有人对他进行这样的指责:谢林令人难以宽恕之处在于,他玩忽教授的职守,长时间不发表任何作品;一个大哲学家难道能这样沉默寡言,鲜与人交吗?^②这

① 同上,第263页。

②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67页。